

广东会馆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略论

张晓飞 白华山

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上海开埠初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上海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广东人作为近代上海最早的移民群体之一,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起义,成为这场起义成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拟以广东人在上海的同乡组织广东会馆为例,对广东会馆与这场起义的关系作一粗略的探讨。

一、广东会馆的职能

上海地区广东会馆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在那时,上海已经有了广东商帮的活动足迹,上海的广东商帮主要由广州帮和潮州帮组成,在此基础上形成潮州会馆与广肇会馆。潮州会馆在上海的建立可追溯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之前,最初由潮州八邑商人公建,^①而后会馆内部发生分裂,由三个商帮析出成立潮惠公所、揭普丰会馆与海澄饶会馆。广肇会馆成立时间较晚,却是广东人在上海势力最大的会馆组织,它的正式形成大概起于同治年间,关于广肇会馆建立的过程,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上海的广东会馆大都是联谊性组织,以地缘为纽带建立,“合庙堂于会馆”,^②既是同乡商人聚会之所,又是祭祀宗教神祇之

① 刘正刚:《广东会馆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2 页。

② 《兴修泉璋会馆碑》,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6 页。

地。广东会馆的基本职能是：“设立丙舍山庄，调解同乡之间的各类纠纷，设立一定的公益设施，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在商业上履行信用担保、维护商业秩序等职责。”^①这使得广东会馆被“称为粤商在沪的一面旗帜”，^②它不仅仅旨在维系商业联谊，传递商业信息，也“大都执行行业管理职能”。^③

广东会馆的组织者，是一些长期从事贸易活动的商帮。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些商帮发挥其长期从事中西贸易的优势，尽占贸易先机，如在烟土贸易业，“上海贩售烟土之华商皆潮州帮”。^④贸易上的优势带来了身份上的优势，而作为同乡纽带的广东会馆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额外保护，如“（潮州会馆）累年营积，契买市房，以充祭业，由来已久……商民偶聚萍踪，往来无定，诚恐印契历久朽烂，且或流传失落，难保无失管被占情事”，上海县衙承诺“倘或失管被占，以及不肖盗卖情事，许即指名稟候”。^⑤

而清政府也有借助会馆管理和约束流动同乡的目的。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整个沙船业衰落，大量以此为生的船工水手们失业，其中不乏闽广籍失业人口，钦差大臣向荣在其奏书中就提到：“伏查广东潮州等府人民繁庶，地方斥鹵……间有失业水手，流落上海等处，为数尚不甚多……迨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须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裁私归公，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自上海以至苏州，动辄聚至盈千累百，向皆责成会馆董事稽查约束，分别遣散，而此去彼来，有增无减。”^⑥两江总督怡良等的奏

①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② 刘正刚：《广东会馆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③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④ 徐珂编：《清稗类钞·农商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18页。

⑤ 《上海县为潮州会馆契买市房以充祭业准予备案告示碑》，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⑥ 向荣：《向荣奏稿》，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46—547页。

折也提到：“上海为闽、广、浙江海舶通商之地。该三省水手失业流落不归者，动辄聚众滋事。向皆由各该省会馆董事，设法周恤安抚。自五口通商以后，内地航海商船遂多歇业，水手流落者日增一日，渐与本地无籍之徒，互相勾结，兴贩鸦片，遇事生风。”^①可见，对于日益增多的失业水手，清政府有借助会馆加以资遣救抚的目的。

由于会馆在上海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小刀会起义前夕，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地区安全，上海地方官员以外省籍人员为主体编练地方团勇，会馆的董事就自然地成了团练乡勇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当时潮州会馆郭文志、嘉应公所李绍熙等奉谕在上海编练广东团勇。^②广东会馆对流动同乡的有效管理，使其成为上海区域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

二、小刀会内部的广东会馆成员

小刀会内部成员构成较为复杂，但总的来说，上海小刀会是以洪门帮会为核心组织发动起来的，据史料记载，“小刀会内分7个帮派，分别为福建的建帮和兴化帮，浙江的宁波帮，上海本土的土著帮，粤人的广帮、潮帮和嘉应帮。”^③这恰好与当时存在于上海的七大会馆相对应。在小刀会的七个帮派中，闽、粤帮就占了五个。而这五个“帮派”的实体即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五个会馆，即福建的兴化（兴安）会馆、泉漳会馆、广东的广安（新安）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④是什么原因致使原本作为维护地方治安的会馆深深地卷入了小刀会起义之中的呢？上海的闽、粤会馆中的成员大多是商业行帮成员和商船主，五口通商后，广大的水手船员失去生计，以剥削这些

① 《两江总督怡良等奏查明嘉定等县小刀会起事缘由并督办上海情形折》（咸丰三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第24页。

② 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史林》1999年第2期。

③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船员劳动力为生的商人也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这正是造成“一些会馆、行帮的成员,也纷纷转入秘密会党,使上海地区的帮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的基本原因。^①

广东会馆成员是否直接参与到小刀会起义中,目前没有直接的史料能够证明。但是从一些侧面可以论证这一事实。以广帮首领刘丽川为例。“刘丽川广潮州人,在邑无家,轻施与,以故同乡人咸悦服推重之。尝为夷商通事,后落魄无生计,抄袭方书为人治伤颇验,遇贫苦不受馈,由此名借甚。小刀会起,推以为首。”^②刘丽川早年活动于香港,首先在香港参加的天地会,他所发展的天地会成员多为无业游民、水手、船夫,且这些人多为广东籍。于1849年到上海经商,组织及成立广肇会馆,集结了大量广东人在上海的势力。后来参加营救因教案而被判死刑的小刀会头目潘启祥,而成为首脑。广东会馆的成立本来就带有极其浓重的乡缘意识,乡民认同感较强。而作为广肇会馆的成立者之一,刘丽川又是所谓贤良谦和之人,受到同乡的推崇和尊重,在会馆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能够带动会馆之人参与起义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北华捷报》记载,“(刘丽川)是占领县城的那群人的真正的首领,是他们出主意并发号施令的头脑”。^③作为广肇会馆的发起人,刘丽川是真正掌握小刀会实权的人,广肇会馆与小刀会的关系由此可知。这里需要额外提到的是,上海最大的两个帮派组织之一的洪帮,也是由刘丽川带入上海的,有不少的洪帮分子参与了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朝对帮会的镇压甚严。洪帮三合会难以在上海立足。直到清末民初,才又浮出水面”。^④

在小刀会七党之中,“粤人七居其三,构成了小刀会起义的基干

① 秦宝琦:《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② 黄本铨:《泉林小史》,《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73页。

③ 《上海法租界史》,《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783页。

④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第58页。

力量”。^① 因此除却广帮首领刘丽川当选为小刀会最高首领这一条件以外,虽然受内部其他各党派的牵制,广帮由于人数的众多也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党,在小刀会内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又由于广帮在上海地区主要集结形式是广肇会馆,所以广东会馆参与其中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广东会馆在起义中的作用

对于广东会馆在小刀会起义中发挥的作用,尽管直接的史料相当匮乏,但我们还是可以在相关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

在小刀会正式成军后会众不断增多,这种迅速发展的势头使清政府感到空前的危机。当时,社会环境并不安定,“城外铺户,屡有抢夺,富家皆以募乡勇以自卫。兵备与诸董事谋,欲散其党而不能。于是诸董事议设条款,欲以小刀会作团练,联名以告兵备”。^② 兵备碍于会馆董事的请求,“不能不从,因勉循其请,飭县依议出示”。^③ 这说明当时会馆已经在社会管理中占有一定的话语权,以致兵备不得不考虑会馆董事的意见。大量的小刀会会员由此名正言顺进入这支乡勇队伍,而促成此事的会馆董事后来大多成为小刀会起义的领导者。正是这种举措的施行,小刀会作为官府授权的正式团练,能将起义部队很好的隐藏,也给小刀会组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小刀会在保存力量的同时提升了战斗力,为小刀会起义打下良好的军事基础。当时有诗云:“结党呼卢本赤贫,滥觞隶作壮丁身,谁知此日雄如虎,即是当时练勇人。”^④很好地说明了这支乡勇对小刀会的保驾护航作用。正是因为会馆董事的干预与提议,才使小刀会保存了战斗力,避免了过早夭折。

据史料记载,上海道台吴健彰与广肇会馆商人刘丽川交往甚

①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第159页。

②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8—39页。

③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8—39页。

④ 姚际唐:《避氛后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1040—1041页。

密,“吴道之始由广东通事起家,家故殷实。经櫜事以后,由出资大集广勇”。^①小刀会起义发生时,“贼入道署,吴道公坐命开大炮,左右从人皆辞以不能,方知署中亲信上下内外皆已通贼”。^②正是有了吴健彰军队中的成员作内应,小刀会才会如此顺利地攻入县城。姚际唐在《避氛后集》中曾作诗云:“私心自用为乡亲,招集南方无赖人。养虎自伤还误国,资财费尽又殃民。”^③形象地表达了吴健彰“养兵为患”的做法。吴健彰的军队中为何“皆已通贼”,与他本人热衷于联络广帮成员是分不开的。

小刀会起义发生时,“1853年八月初五日,小刀会从小东门、北门而进,直入县治,杀知县袁祖德,挟巡道吴健彰至西城广东会馆[即今参镇署]欲吴共事,不从,闭于室”。^④尽管此则史料没有明说,但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广东会馆肯定也是小刀会的重要聚集地之一。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清政府在小刀会起义后采取的惩治措施中了解到广东会馆在小刀会起义中卷入的程度。小刀会起义失败后,“初三日,巡抚入城,督饬道县,抚恤灾黎,办理善后,奏陈十事:一、慎选闽、广会馆董事。一、递籍安插闽、广游民。一、闽、广商民会馆俱迁城外。”^⑤清朝政府对闽广籍人士采取了严厉的惩治措施,“永禁闽、广人入城居住。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府,一概入官,变抵充公。”^⑥

四、小刀会起义中会馆内部的分裂

会馆与帮派的结合,使得各个帮派内部纪律性强,且各帮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是,各帮派排他性也较强,这使得各个帮派

① 姚际唐:《避氛后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040—1041页。

② 姚际唐:《避氛后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040—1041页。

③ 姚际唐:《避氛后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039页。

④ 毛祥麟:《三略汇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85页。

⑤ 叶廷眷、俞樾:《上海县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61页。

⑥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之间“各立门户,时竞强弱,俨如仇敌”。^①这种由秘密会党临时拼凑起来的军事组织形式,使得这场起义有着先天的缺陷,埋下了隐患。

在小刀会起义前期,清政府就采取边打击边招抚的策略,意图将起义扼杀。起义如火如荼后,清政府节节败北,于是加紧招抚步伐。1853年12月10日以后,清朝已革候选知府谢继超自江南大营来到上海,专为从事招降计划。在谢继超的威逼利诱之下,以李绍熙、陈阿六为首的广东会馆内部的嘉应帮在鼓动刘丽川投降失败的情况下,背叛了起义队伍,引起小刀会内部的自相残杀,严重削减了起义力量,以致出现“渐思离散”、“势将内乱”的情况。^②时李绍熙已降,“(陈阿六)见李绍熙投诚授职,遂函通绍熙,愿为内应。十二月初三日,李绍熙复书入城,为刘贼所得,尽杀嘉应州党二百余人……是役也,以降贼为前锋,故得其死力”。^③由此可见在这场战役中嘉应党人的离心作用对于小刀会起义的最终失败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李绍熙等嘉应叛党在背叛起义军后反成为清政府的帮凶,参与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

伴随着小刀会起义的失败,上海广东会馆也由盛而衰。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认为同籍聚居容易生事,“下令拆除潮州会馆并强迫广东籍人迁移分散,一部分广东人迁移到高昌庙附近,另一部分被迁距县城较远的虹口美租界内的天潼路附近”。^④上海再也不是闽广籍移民的天下了。此前,上海广东籍移民有8万人,福建籍有6万人;此后,闽广籍移民急剧下滑,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广东籍移民仅为21013人,福建籍为708人。^⑤

我们不能说广东会馆在小刀会起义中的参与起到了决定性的

① 曹晟:《觉醒录》,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②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180页。

③ 毛祥麟:《三略汇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89页。

④ 刘正刚:《广东会馆史稿》,第91页。

⑤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作用。广东会馆的参与,并没有改变小刀会起义的性质与结果。但不可否认,正是因为有广东会馆的参与,小刀会起义才能以一场局部的斗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影响了上海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张晓飞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白华山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